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林家有 主编

中心与边缘

——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

◆ 刘进 著

Centre and Margin

天津古籍出版社

D693
L635

近现代中国
政治
与社会变迁



中心与边缘

——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

Centre and Margin



著



20028990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刘进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7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林家有主编)
ISBN 7-80696-100-3

I. 中... II. 刘... III. 政治—研究—西北地区—
民国 IV. 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896 号

中心与边缘

——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

刘进/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张 21.6 插页 2 字数 291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96-100-3

定价:35.00 元

总序

Preface



总序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方，掌握中国的统治权；以广大的爱国、革命的人民大众和追求进步、追赶时代潮流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方。两方代表着中国的两种社会势力，反映近代中国的两种前途，他们的政治理念、思想，以及改革中国的主张制约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近代中国政治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



心内容和基础背景。现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里,国家的权力中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在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突破,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控制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政治变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更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研究重心有从社会各面向中心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的客观要求。既往的政治史研究,着重于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安,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提高。本课题把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入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见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升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过去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陷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間仍然较大。我们中山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和优势,在孙中山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列,讲求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形成求实求真的精神和相互协作的学术风气,在多个方面颇具潜力。参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课题研究的有老一辈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后研究者,其余均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班子,各人就其兴趣和研究所得进行新探索;不少论著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的良好评价,经过反复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作品。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视野和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各

有特色、各有优长,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丛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对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所帮助与启迪。当然,我们更期望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得知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后,慨然应允,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 and 高质量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我们除了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外,也对他们为出版学术著作、传播精神文明的精神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林家有

2003年11月于广州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总序



总
序

目 录



导 论	1
一、选题旨趣	1
二、学术史	9
三、资料概况	21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24
第一章 国民军与甘宁青政局	28
第一节 国民军统治下的甘宁青政治与社会	28
第二节 南京政权的抉择	54
第二章 底定甘肃	70
第一节 在中央权威与地方势力之间	70
——邵力子主政甘肃透析	
第二节 “安定中求进步”	91
——朱绍良第一次主甘	
第三章 中央政权统驭诸马的政治谋略	116
第一节 孙殿英事件	116



第二节 笼络与压缩	137
——抗战期间经略西北中的中央政权与诸马关系	
第四章 地方政权与基层社会	160
第一节 甘肃:混沌的政权与社会	161
第二节 青海与宁夏:严密的控制网络	193
第五章 民族与宗教	218
第一节 诸马与民族宗教问题	219
第二节 羁縻与威慑	240
——对甘肃三个案例的观察	
第三节 国民党民族宗教政策之评价	274
第六章 财政与建设	285
第一节 财政	285
第二节 经济与文化建设	302
第三节 开发西北:理想与现实	326
——以 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政府讨论裁减公务员 开发西北问题为中心	
结束语	348
征引文献	366
后 记	380



一、选题旨趣

在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期，“开发西北”曾是朝野人士经常谈论的话题，这个口号其实与国内诸种危机，如人口过剩、生产低落，尤其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边疆危机有很大关系。但当时国民党政权治理西北的成效怎样？西北社会内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态？目前似尚无整体性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研究国民党统治甘宁青地区的历史即是做一尝试。

甘宁青三省 1929 年以前在政区上为一个整体，同属于甘肃省^①。这三省位居黄河上游，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对该地区的控制，它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中原王朝的盛衰。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国民党政权时期，三省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仍有着紧密联系。

^① 1929 年甘青宁分省前，西宁道属七县属甘肃。其西部蒙藏游牧区即青海，在清代设青海办事大臣掌理，北洋时期改为青海办事长官，1915 年复改称蒙番宣慰使，均驻节西宁。



此一时期,国人仍将甘宁青视为“边疆”或“次边疆”地区^①,其原因从时人有意或无意的言论中可见一斑。1932年,甘肃人水寄梅说:“就地理上言之:现代文化,趋于大同,凡沿海沿江之地,交通便利,文化发达,是为自然之趋势。甘肃偏处西北,水不通航,山难行车,在国人心目中,仿佛列于化外,而不能与内地比论。”^②此言虽从地理的角度切入,没有直接提及甘肃为边疆,然其实质乃以文化是否达到“现代”的标准衡之,无疑是说该地区仍列边疆。1943年,朱允让分析说:“甘肃虽列为内地省份之一,然以往昔交通之梗塞,军阀土劣之剥削,致使民生疾苦,教育未能普及,文化日形落后,一部分地区虽较进步,而尚有许多边远之区域,一般同胞尚过其原始之生活,全为神权与迷信所笼罩,因而甘肃亦列入边疆身份之侧矣。”^③这里强调的仍为“文

①当时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西北人士,还是西北以外人士,大都称甘宁青为“边陲”或者“边省”。1934年10月,蒋介石视察兰州,认为“甘肃僻处西陲,交通阻塞,新知识不易输入,因此文化较为落后”(蒋介石:《对甘肃各界同胞之希望》。《甘肃省府公报》,第4卷第5~8期合刊,第3页)。西北本地人士更强调甘宁青为“边陲”地区。1930年,马福祥等甘肃人向国民党中央请求赈济甘肃灾荒,在呈文中说:“窃查甘肃僻处西陲,交通阻隔。”(《马福祥、水梓、牛载坤请愿四中全会迅派专员放赈》。《甘肃赈务会会刊》第2期,1930年)1938年,马步芳说:“本省虽然是僻处边陲,但就整个国家观察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国防据点,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非常的深。”(《马主席对乐都公务人员训词》。《青海省政府公报》第68期,1938年6月,第95页)1945年出版的《财政年鉴续编》载:“甘宁青三省,地处边疆,交通梗塞,运输至为不易。”(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续编》下册,1945年,第123页。甘肃省档案馆:卷宗号:建国前资料/工业农业财经/财经438)(以下注释将甘肃省档案馆简称“甘档”)这样的提法,在时人言论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陲”,按《辞海》之解释,为“边疆”之意(《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438页)

②水寄梅:《甘肃教育现况与改善计划》。《新甘肃》(兰州),创刊号,1932年,第32页。

③朱允让:《甘肃边教之概况及其改进刍议》。《现代西北》(兰州),第4卷第1期,1943年1月,第75页。



化”因素,不过包括了人民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广义的“文化”。

可见,当时甘宁青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交流稀少,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故被国人目为边疆或边远地区。顾名思义,边疆就是一个国家领土的边缘疆域,但黄奋生认为,中国边疆的解释,非这一意义所能包含,“因为一般人对于中国边疆的看法除了中国边缘的疆域,如辽、吉、黑、外蒙、新疆、西藏、西康、广西等省或地方而外,对于热、察、绥、甘、宁、青等位居腹地之省份,也称之为边疆”。因此,他对中国边疆做了如下的界说:“中国的边疆,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接壤的区域;一则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发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文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①按此种解释,颇能道出国人视甘宁青为边陲之含义^②。

“九一八”事变后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开发西北问题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各种考察、计划,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毫无疑问,不管

①黄奋生:《泛论边疆教育》。《西北通讯》(南京),第3期,1947年5月,第4页。

②应该指出,也有人对当时国人普遍的“边疆”认识,提出不同的看法。1943年3月,《大公报》发表题为《矫正国人认识边疆之错误》的文章,其中说:“一个国家的边界就是一个国家的边防线,所谓‘边疆’,应系指接近国防线的地带而言”,而“我们今日所称‘边疆’,盖不如此,今之所谓边疆系指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宁夏绥远察哈尔新疆西康热河十省及西藏蒙古而言,包括通常所说东北西北二部”,这种划分之法至为不合理,因为“热河绥远察哈尔宁夏青海五省并无一处与外国接壤,竟亦在边疆之列,尤属不伦,这种错误的边疆观念的来源,当系本之古代以长城为边界的历史”。作者立论的用意,在于激励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积极的经营姿态。不过,该文恰好表明,其时国人对“边疆”一词的主流认识与定位(《矫正国人认识边疆之错误》。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1~244页)。



国人的“西北”范围所指为何，甘宁青地区一般都包括在内^①。事实上，朝野人士一般均在西北的大视野之下看待甘宁青三省问题，这并

- ① “西北”一词的内涵与外延，自清末以来变动不居，并无官方特定范围。在清末，有论者认为：“吾国向于西北政治上颇有建树，视为重镇要害，而设专官于其地者，有曰盛京，曰吉林，曰黑龙江，曰珲春，曰三姓，曰宁古塔，曰伯都讷，曰呼伦贝尔，曰库伦，曰乌里雅苏台，曰科布多，曰塔尔巴哈台，曰伊犁，曰西藏。”（《国家今日急宜经营西北说》。《东方杂志》，第5年第6号，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309~310页）在这里，“西北”指称中国西部与北部的陆地边疆地区。民国以来，陕、甘等省在时人的言论中常常包括在“西北”以内，譬如，1924年举行的全国实业代表会议在其关于筹办西北垦牧业的议案中说：“盖西北一带，如陕、甘，如接壤之蒙古、新疆、青海等地，一望无垠。”（《全国实业代表会议关于筹办西北垦牧业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69页）（以下注释中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称“二档”）20世纪30年代后，因蒙古等地事实上已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一般国人所称“西北”，其范围大为缩小，不少人以所谓“远西北”与“近西北”之说来界定西北范围。“远西北”一般指西藏、新疆、蒙古等与邻国接壤的边疆地区，“近西北”则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等省，而论述的重点则往往放在“近西北”。抗战以来，“西北”专指陕、甘、宁、青、新五省的倾向愈益明显，这从国民政府当时颁布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不过，在整个国民党政权时期，政府没有对西北的范围做出明确、统一规定，而言西北问题者往往各自定义一番，甚至有人以河南和山西皆为西北。1934年，戴季陶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目前一般人所谓西北，大都是指中国腹地，顾名思义，西北两字，应该是西北的边区，现在差不多以潼关以内的地方，统统叫做西北，其实在历史上陕西、河南一带，都是中国的中原，从地图上看去，也是在当中，至少要甘肃以西，才能叫做西北，不过这一带地方，因为多少年来，只有破坏，而无建设，文化的衰落，的确同边地一样，经济情形，也是如此。”（戴季陶：《西北救灾与兴业的起点》。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0年，第93页）由此可见，除了地理因素，当时国人亦从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角度，界定西北的范围。但不管民国以来的“西北”所指范围为何，一般都包括甘宁青地区在内。参见张力：《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1989年6月，第164~167页。



非全无道理。从地理、历史、民族与社会的发展阶段等方面观察,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自有其内在联系。薛桂轮为1933年随黄慕松宣慰新疆之随员,他认为,西北五省“为唇齿之互保,辅车之相倚。任何一省发生问题,其余各省必遭波及,不过时间有先后,影响有大小而已。明乎此则可知欲解决任何困难必须以西北全局为前提。若枝枝节节,任意缩小范围,名曰是某某省问题也,将见纠纷愈演而愈长,离解决之途更远矣”。他在分析了五省在地理、物产、种族等方面的共同点后得出结论:“开发西北必须有整个计划。凡百设施,必须以全局为范围,切不可仅以一省和一区为目标。”^①

但是,甘宁青在西北仍具有其独特性。终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之历史,发源于甘肃临夏的诸马军阀集团始终活跃于西北政坛,它们相沿不断地控制着宁夏与青海地方政权,并觊觎甘肃政权,对甘肃社会与政治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欲在西北一展身手的政治、军事势力无不看重甘肃对宁青的控驭作用。不但如此,由于甘宁青所处的地理区位与民族状况,使其在经营边疆中的作用依然重要。其时,即有人把三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

甘肃、青海、宁夏三省,位于我国版图之西北隅,西接新疆,西南界西藏,北与外蒙古为邻,西康、四川、陕西绥远等省环绕其东南两面,自古以来,即为形胜之地。目下则外蒙古形成离贰,西藏日启纠纷,操纵之权,仍在帝国主义之手,倘蒙藏竟被其吞并,则甘青宁三省必亦在其梦想之中;且新疆北部因与俄属中亚细亚比邻,当帝俄时代,已有重兵常川侵驻,迄今俄政虽变,其驻兵窥视之策略,仍未稍改,直接的可以害及新疆,间接的亦属甘青

^①薛桂轮:《开发西北的原则》。《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上海),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第36页。



宁之隐患。且境内居民，除汉回两民族外，尚有蒙古撒拉缠头番土诸族，信教既不相同，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亦殊各别，党同伐异，自古已然，仇杀相寻，迄今无已。是则甘青宁三省，在今日环境之下，实成为外患内忧交迫之区矣。加以交通不便，开发稽迟，地藏未能尽辟，政治鲜见刷新，连年灾祸，民不聊生，坐令天富之区，复成筚路之境，利弃于地，其可惜孰有甚于斯乎？

不特此也，甘青宁三省，居西北版图之中心，为通达边陲之孔道，中原与外藩往来之枢纽，亦一切政治、文化、经济之过站也。质言之，三省不事建设，即不足以顾及边陲，边陲各地若无三省之贯通，必与中原形成隔阂。是其地位之重要，尚不止于其本身也。^①

在民国时期，仍将中国固有的边疆地区称为“外藩”，自属不妥，但上述言论亦有真知灼见，基本上反映了国民党当政时期朝野人士对甘宁青地区地位的认识，他们观察西北，多着眼于其国防意义。就西北五省而言，陕西在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地理上是西北与中原地区的结合部，为西北经济文化水平发展最高的省份，历代王朝乃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大都能直接控制该省，因此，“就地域之部位论，陕西最不应称为西北，但陕西实为踏进西北之跳板”^②。新疆则为边陲前沿，中央政权常感鞭长莫及，外国势力在此错综复杂。“甘肃实为西北咽喉”^③。宁夏、青海形成两翼，为西北的中间地带。可以说，甘宁青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但交通不便，处于封闭状

①杨劲支：《建设甘青宁三省刍议》，南京，京华印书馆，1931年，第1~2页。

②罗家伦：《西北建设考察报告》。《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76年，第200页。

③《西北建设考察报告》。《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册，第200页。



态,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对于该地区的社会深层结构的触动甚缓,风气闭塞,在中央权威衰微之时,易于滋生地方集团势力。但是,受当地自然地理、经济等环境的制约,很难形成逐鹿中原的政治集团。不过,该地区的动荡,必将减弱中央政府控制边疆地区的能力。甘宁青三省亦为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生活着回、藏、蒙、哈萨克等诸少数民族,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在少数民族中盛行,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政权处理民族与宗教事务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是其统治该地区能力的重要表征之一。

因此,在“西北”这一视野中考察国民党政权经略甘宁青的历史,是有一定价值的。

民国西北史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过去对整个甘宁青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或许与近代的甘宁青地区经济文化衰落、文风不盛、遗留的历史文献极难搜寻的客观原因不无关系。但是,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在其历史进程中,除了共性以外,多有其独特的一面。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早就意识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种亚文化群所打破。”^①他认识到:“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②此乃外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体悟,对于本国的研究者亦不例外。由于中国区域性与变异性的幅度很大,区域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对整体史研究的深化。正是基于此种缘

①[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7页。



由,最近二十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内,区域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遗憾的是,西北地区,尤其是甘宁青地区的研究,相形之下,明显滞后。因此,本文试图对甘宁青这样一个具有个性特征地区的历史,截取片段,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亦着眼于其现实意义。宋元以降,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贸易日益兴隆,西北内陆地区日渐疏离国内、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圈,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国内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失衡,在本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清代,甘肃为协饷省份^①。辛亥革命以后,各省协饷断绝,地方政权尤感举步维艰,各种从民间聚敛财富的苛捐杂税如“雨后春笋”。中央政权控制边远省区的政治与财政资源枯竭。中央与甘宁青地方、内地与西北边疆之间经济与文化的沟通渠道不畅,地方势力勃兴,隔阂进一步加深^②。内地人民不了解西北边疆,视西北的新疆、青海等省为神秘之地,去那里考察,名之曰“探险”。即使是中央政权,对那里发生的事件,常常真相难明,不知所措。1933年以后,国民党在甘肃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地位,开始着手进行经济等项建设事业,但所获甚微。抗日战争期间,甘宁青成为战略物资进出中国的国际交通路线,一时间人才云集,建设事业亦有进展,然而这是在东北与东南富庶之区沦陷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如何协调国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经济资源、人才资源、教育文化资源等方面的配置关系,既发挥中央政权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又调动本地区及

①甘肃在晚清的协饷及其后的财政状况,将在第六章探讨。

②黄建华的研究亦认为,“民国时期新疆半割据局面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地方军阀人为造成的”,“新疆在政治上对中央政府依存度下降”与其“在经济上对中国内地的依存度也大大下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其民间力量,推动后发地区社会的进步,国民党中央政权并非不曾虑及与措手。南京国民政府于30年代初建立过专门负责西北建设的机构;抗战期间,出于控制新疆与利用抗战的有利时机进行西北建设,蒋介石亲自推动“西北开发”政策的讨论与实施。但是,国民党并不成功。探究其间的根由,对于今日似尚有借鉴意义。

二、学术史

1949年以前相关的时人论著是对当时现实问题的记述、观察与思考,一般不具有史学研究的性质,加之处于本课题的研究时段,故本文作为史料来应用。1949年至1980年间主要有各级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其中辑录了不少记述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关甘宁青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状况的回忆性文章,本文也作为史料看待。1949年至1980年间,为数不多的研究该区域的论著,多着眼于革命力量的奋斗史与人民群众的抗争史,对于统治阶级的研究尚未纳入视野。在回民起义、农民起义与中共革命力量的研究中,间或涉及国民党政权,但往往是揭露其统治与政策的反动性,尚未能进行系统与客观的研究,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仅有少量论述社会冲突等方面的文章^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国时期甘宁青史研究,逐步取得一些成果,一些通史性著作相继问世。《宁夏近代历史纪年》^②、《青海历史纪

①如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现代史》编写小组:《抗日战争时期的甘南农民起义》,载《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3期;马骏:《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次回民起义》,载《光明日报》,1958年9月1日。

②吴忠礼:《宁夏近代历史纪年》,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